



VI HORAS

陈壁生 著

经学的瓦解

The Collapse of Confucian Classics



经学的瓦解

陈壁生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的瓦解: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 / 陈壁生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675-1147-7

I. ①经… II. ①陈…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8409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六点评论

经学的瓦解

著 者 陈壁生
责任编辑 倪为国 何花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插 页 4
印 张 5.75
字 数 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147-7/B · 799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关注中国问题
重铸中国故事

缘 起

在思想史上,“犹太人”一直作为一个“问题”横贯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人们众多问题的思考线索。在当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突显的是“中国人”也已成为一个“问题”,摆在世界面前,成为众说纷纭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崛起强盛,这个问题将日趋突出、尖锐。无论你有什么立场,这是未来几代人必须承受且重负的。究其因,简言之:中国人站起来了!

百年来,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切肤经验,使我们许多人确信一个“普世神话”:中国“东亚病夫”的身子骨只能从西方的“药铺”抓药,方可自信长大成人。于是,我们在技术进步中选择了“被奴役”,我们在绝对的娱乐化中接受“民主”,我们在大众的唾沫中享受“自由”。今日乃是技术图景之世

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我们站起来的身子结实了,但我们的头颅依旧无法昂起。

中国有个神话,叫《西游记》。说的是师徒四人,历尽劫波,赴西天“取经”之事。这个神话的“微言大义”:取经不易,一路上,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取真经更难,征途中,真真假假,迷惑不绝。当下之中国实乃在“取经”之途,正所谓“敢问路在何方”?

取“经”自然为了念“经”,念经当然为了修成“正果”。问题是:我们渴望修成的“正果”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经”?从哪里“取经”?取什么“经”?念什么“经”?这自然攸关我们这个国家崛起之旅、我们这个民族复兴之路。

清理、辨析我们的思想食谱,在纷繁的思想光谱中,寻找中国人的“底色”,重铸中国的“故事”,关注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六点评论”旨趣所在。

点 点

2011.8.10

1	导言：“后经学时代”的经学
	Introduction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Post Confucian Classics Era”
10	第一章 章太炎的“新经学”
	Chapter One The “New Confucian Classics” by Zhang Taiyan
52	第二章 中国：成为“历史”
	Chapter Two China: Becoming “History”
73	第三章 胡适之：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的完成
	Chapter Three Hu Shizhi: From “Classics – centered Theory” to “History – centered Theory”
108	第四章 孔子与六经的分离
	Chapter Four The Separation of Kongzi and the Six Classics
135	第五章 经学的史料化与经学的瓦解
	Chapter Five Historicism and the collapse of Confucian Classics
166	结语：为往圣继绝学
	Conclusion Succeed Wisdom for Sages
170	后记
	Epilogue

导言：“后经学时代”的经学

一

民国十六年，即西元 1927 年，时距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废除经学科的民元年仅十五年，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出版了《中国经学史》（孙俚工译名。江侠庵将书名译为《经学史论》），在结尾处，本田成之写道：

埃及和迦勒底学问，在其本国已亡掉了，希腊的学问，在他的本国已亡，而在他国却完全保存着呢。佛教也是这样！回想我以前，在南华某人家，曾见左宗棠墨迹一联云“异国古书留日本。”像经学这一学科，将或失于中国，而被存于日本，也未可知，我于此有无限的感慨了。^①

^① 本田成之著，孙俚工译：《中国经学史》，台北：学海出版社，第 320 页。

至1928年,周予同先生在为皮锡瑞《经学历史》作注之后所写的序言,针对当时的学界风气,对本田成之有一个回应:“以具有二千多年经学研究的国度,而整理经学史料的责任竟让给别国的学者,这在我们研究学术史的人,不能不刺骨地感到惭愧了。”^①

本田成之感慨之时,廖平、章太炎诸大师俱在,但经学研究之一落千丈,已然使东瀛学者,隔海叹息。九年之后,周予同惭愧之日,经师如曹元弼、蒙文通、李源澄诸公正健,而经学研究之凋零寥落,也让周予同这样的学界名家慨叹有加。况且,不论是本田成之,抑或是周予同,他们所谓的经学,都不是在“经”的意义上的经学,而只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的组成部分而已。

事实上,随着帝制崩溃,共和肇造,经学也因之瓦解,进入“后经学时代”。“后经学时代”是少明师在《走向后经学时代》一文中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在社会政治层次上,经学失却其合法性依据的地位,中国社会形式上走向法理化的时代;其二,在学术文化的层次上,对经的研究不必站在宗经的立场上。”^②也就是说,随着辛亥

^① 周予同:《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② 陈少明:《走向后经学时代》,《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

革命带来的帝制消失，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反传统思潮，中国学术也卷入了一场深层次的“革命”之中。

这场革命，核心内容就是经学的瓦解。

从经学科的取消到本田成之对经学亡于中国的隔海感慨，仅仅相隔十五年的时间，而这正是中国学术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五年。在这段时间中，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整体性从章太炎的“以史为本”转向胡适之的“以史料为本”，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古史辨相继兴起，全面移植西方学术分科，从而实现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所谓“中国现代学术”的基本格局。

二

这场学术革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晚清。早在辛亥之变的前夜，经学便已经发生了深重的危机。

首先是西学东来对经学的冲击。在中国自汉以后的历史上，经学为政治之大宪章，政教之兴废，往往牵连经学的盛衰。政、学结合越是紧密，其兴亡越是休戚相关。例如汉世立今文十四博士之学，皆以为孔子之一王大法是“为汉制法”，汉魏之间天下大乱，遂有周公之法的兴起，而古文乃替今文而兴。至于清末，经学行世已二千余载，清代政治，虽非依经而立，但仍然尊经崇圣，政治危机同样带来经学的危机。辛亥之前，已有焚经之议。皮锡瑞于光绪十三年（西元 1907

年)刊行《经学历史》，其中说到，清末“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①后来熊十力著《论六经》也说：“时海内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余亦如是。皮锡瑞在清末著《经学史》一小册，曾谓当时有烧经之说，盖实录也。”^②

同时，即便在中学研究中，诸子学的兴起，也冲击着经学的独尊地位。清代之诸子学研究，一开始只是以考证经书之法考证诸子，而随着西学东来，诸子学与西学之冥合，推动了诸子学研究。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观察，他说：“夫以诸子之学，而与西来之学，其互相因缘而并兴者，是盖有故焉。一则诸子之书，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任举一端，而皆有冥合之处，互观参考，而所得良多。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一则我国自汉以来，以儒教定于一尊，传之千余年。一旦而一新种族挟一新宗教以入吾国，其始未尝不大怪之，及久而察其所奉之教，行之其国，未尝不治，且其治或大过于吾国，于是恍然于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而一尊之说破矣。”^③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41页。

② 熊十力：《论六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另如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农历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记：“今人皆悟民主之善，平等之美，遂疑古圣贤帝王所说道义，所立法度，多有未当，于是敢于非圣人。”（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

③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9期，1905年10月出版。

但是,经学的危机更重要表现在经学内部。晚清民初,中国学者面临着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一大变局的要素,即在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在此之前,所谓中国者,乃是一绵延不绝的文明体,中夏王朝,自居天下中心,对周边小邦,视为蛮夷。一朝一代,各有不同的疆域。及至晚清,在西方列强的刺激下,晚清学者产生了明确的“中西之别”,而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国”概念,便必须将整个中国文明体进行系统化,将历史上王朝参差更迭,整体化地整合为一个地域上具有统一性、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国家叙事,也就是说,在中国固有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中国”。这种“建国意识”,落实在学术研究中,便要求建立“中国”的、系统化的思想体系。这一意识在学术研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各种专门之学的通史类著作的书写。中国最早的系统化专门史写作,多由日本学者导其先路,早在1900年之前,日本已经有不少关于中国学问的通史类著作,中国哲学史方面,有内田周平的《支那哲学史》(1888年版,只写到先秦部分)、松本文三郎的《支那哲学史》(1898年版,第一部中国哲学通史)、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1900年版)等,文学方面,有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1897年版)。为什么这种专门史写作,日本人都比中国本土学者着先一步呢?这不止因为日本的学术更早西化,更重要的是,日本更早学习西方而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从而将中国也看成一个民族国家。只有成为民族国家,专门史的写作才有一个固定的空间。中国近代的系统化的专门史写作,都集中

在1900年前后,其中包括: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1905年),是对经学历史的总结;夏曾佑的《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1904年,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是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是对中国文学史的梳理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现,正是因为中国历史已经开始由天下主义转人民族国家时代,需要站在新的“中国”的角度重新看待以前以一家一姓的朝代为单位的经学、历史、文学发展,也就是说,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为这些专门的“史”类著作的书写,提供了一个空间立足点。

在经学方面,晚清之世的经学,已经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共同崛起的局面。有了“系统化”的要求之后,便必须将经学整合成为一个同条共贯的价值体系。这是晚清经师所面对的共同考验。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政治格局中,学分四部,学者只需要讨论具体的各种问题,而不需要,也不可能去用整体的眼光去将所有问题整合到一个系统之中。因为有系统就一定要有边界,中国学问面对的是天下的问题,天下是没有边界的,因此学问也没有边界,无论是讲明一经,还是弘扬一派,都可以直接达到治学论政的目的。但是,当西方文明夹带着民族国家时代到来,有了一个西方文明的参照之后,“中国是什么”,或者“中国文明是什么”,就成为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呈现出来了。而要将中国文明系统化,就一定要有一个角度才能说清楚整个文明。

当廖平写成《今古学考》之后,今古文之分,终于判若冰

炭。廖平之前,凡古文为考据训诂,今文讲微言大义,可以各不相妨,虽偶有争论辩驳,皆无关于政治社会。但是,经学一旦有系统化的时代需要之后,像乾嘉、咸同之学那样简单地辨析字义,注疏一经,已然不能真正回应现实,要回应现实,必须从理论上回到“什么是经学”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上来。但问题在于,自汉末郑玄混今古二家之别,以成一家之言,经学成为“不同时代的圣人之法的集合体”。晚清今文经师要从这一不同圣人之法的集合体中,寻找出纯正而自成系统的“孔子之法”,因此,不得不推翻一切与其制度、义理相悖的古文经典,遂有廖平二变的《知圣篇》、《辟刘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出。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绕过郑玄回到西汉,对二千多年来的经学进行一场重新清理,检视西汉以《春秋》为中心的今文经说,使经学重归孔子口传的微言大义。在今文学看来,经学就是孔子的“一王大法”,是抽象价值而不是具体法度。而在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时代,最根本之处就是要重归孔子之法,以孔子之法所表现出来的抽象价值,作为国家构建的“灵魂”。而古文经学同样面对郑玄的问题,他们更进一步将郑玄所提出的不同时代圣人之法的集合体,建构成为新的“国家历史”的源头,于是夷经为史,遂有章太炎视六经为古史,以孔子为史家之说出。在古文经学看来,经学就是尧舜以来的历史记载,并且,这种历史记载对后来历代修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历史的源头。要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便必须通过对六经的历史化解读,

寻找这个民族的源头所在,以历史作为国家构建的“国本”。

今文经学的现代发展,至康有为、廖平而彰显孔子一王大法,以六经之抽象价值为国家构建的理论源头。而古文经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则成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史学,通过历史寻找“中国”。

但是,在后来的学术史发展中,今古文二家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今文经学为了回归孔子而推翻古文经典,开启民国“古史辨”的先声,而古文经学夷经为史,导夫民国以经学为史料之先路。

三

民元之后,经学科废,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至此消失。随之发生的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事实上是以章太炎为先导,以胡适之为中心。

章太炎的先导意义,在于他看待中国学术,是“以史为本”的态度。中国学术本以六经为本源,而在晚清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章太炎为了寻找一个民族国家建国的深厚根基,乃不惜将整个中国文明视为“史”,从历史来论述民族。这样,六经成为古老的历史记载,成为文明史的源头。章太炎夷六经为古史,视孔子为史家,将整个中国学术都建立到“史”的基础上,这是对以经为主导的传统学术的一次大变革。

假设经学不废,则章氏之学,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

正统源头,使中国史学继司马迁之后,实现再次从经学内部重新出发,建立全面的历史叙事传统。但民国创立,经学渐成土苴,今文经师之说,衍为孔教会,行之未久。章氏之学,虽一度大行于天下,但随着留洋学生归国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西之别变成古今之争,章氏“国故”之论,本为发扬国史之光辉,转化为胡适之的“国学”,则变成已死之历史。在胡适之等西化论者眼中,“中国”成为“历史”,中国一切典籍,成为死去的史料,于是倡导“整理国故”,以西方学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典籍,建立起中国现代学科。至此,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完成,而经学终至全面瓦解。